

金朝孔庙释奠礼初探

徐 洁

(白城师范学院 历史学院 吉林 白城 137000)

摘 要: 释奠礼是古代祭祀先圣先师之礼,在金朝释奠礼属于五礼中吉礼的范畴。在孔庙规制上,金代首用雕龙石柱,将其制式同于皇宫;首建“灵星门”,崇孔同于尊天;赐孔子以古制天子冠冕,崇孔至隆。从文明发展史上看,金统治者接受了儒家“道统”,在北方“蛮夷”之地推行礼仪教化,加速了北方文明化的进程。在礼制传承方面,金远追周礼,承唐继宋,敬礼孔子,告奠圣灵,成一代之释奠祀典;又下启元明,为中华礼仪文明传承做出重大贡献。

关键词: 金朝;孔庙;释奠礼;吉礼

中图分类号: K2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5)11-0155-06

释奠礼原是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陈设酒食以祭奠先圣先师,属于“三礼”天神、人鬼、地祇中的“君师”之礼。在古人的观念中,“师”与君主都是天之所命,他们同神灵般享受祭祀“先师”之礼。关于“释奠”的含义,《古今图书集成》解释为“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无尸、无食饮酬酢等事”。祭祀先圣先师最初只是始立学堂或者学子入学的仪式,而祭祀对象并没有具体的确指。《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先师。秋冬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商周时期,已设置官学,周代的官学中,就有释奠先圣先师的礼仪。西汉初,汉高祖过阙里以太牢之礼祀孔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从此成为官方统治思想;至东汉,孔子被称为“先师”,后又被尊为先圣,成为帝王尊崇膜拜的对象。先师享受如同神灵一样的祭祀^{[1]22-23}。至隋朝,太学国子监于每年四季中第二个月的上丁日祭奠孔子。而孔庙作为儒家道统的象征,其祀典基本定型于唐朝。宋朝文治特盛,

孔子释典又视前朝有加^{[2]155-156}。

关于金代释奠礼,目前学界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仅见数篇金代孔庙方面的论文:张敏杰指出,金朝的女真统治者对孔庙进行了大规模新建、重建、扩建和修葺,不仅光大了儒家思想,传承了民族文化,而且也加速了女真族的封建化过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3];于学斌、孙雪坤指出,金代孔庙的发展是由于统治者推崇儒学和文治的需要,是尊孔崇儒、实行文治的重要手段^[4];张帆探讨了金代地方官学发展历程,提出庙学就是官学,特别是地方官学的观点^[5];张鸣歧概述了辽、金、元各朝建庙设学的历史,探讨了庙学的构成、发展与定名,指出庙是为了更好的尊孔重教以兴儒,学是为了崇儒传道以养士化民。两者结成一体并形成制度,至北宋便对各级儒学明确称为“庙学”。建庙必设学、设学必建庙以祀孔子,庙学是对各级儒学的通称^[6]。这些研究成果使我们对金代孔庙的修建、发展及其作用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是,作者基本都是着眼于儒家文化传承或教化兴学等文化史或教育史的视域,并没有从礼制的视角探讨金代孔庙释奠礼,故而,这一问题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

一、金代释奠制度的确立

金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从以武得国

收稿日期:2015-08-28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金代儒家礼制与社会和谐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15]第378号)

作者简介:徐洁(1969—),女,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辽金史研究。

到以文治国,其间孔庙释奠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孔庙是尊孔崇儒的礼制建筑,释奠礼是其最为醒目的倡行儒家文化的标志。

(一) 从斥孔到尊孔

太祖、太宗两朝“儒学之事未遑遍举”^{[7]1125},但金兵南下之初,即有少数上层统治者意识到借鉴儒家思想为国家统治服务的重要性。天会五年(1127)宗尧“为右副元帅,驻燕京,虽戎马未息,首建太学,修国子监”^{[8]29}。但就金兵而言,初下中原时,对汉族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对中原王朝传统文化主要标志的孔庙,多加焚毁,有的“毒于兵火,煨烬之余,仅存讲堂”^{[7]301},有的“兵火之余,踪迹荡尽”^{[7]958}。“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修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9]76},在金兵面前却难逃劫难,金兵指孔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遂将先圣旧宅毁为烟尘,庙学“悉为将兵毁折”^{[7]934}。金初上层将领中亦有不闻孔子者,天会六年(1128)十二月,金兵“破袭庆府,有欲伐孔子墓者,诛之。”“时汉儿将启孔子墓,粘罕(宗翰)问曰‘孔子何人?’通事高庆裔曰‘古之大圣人。’曰‘大圣人墓焉可伐?’尽杀之,故阙里得全。”^{[10]81}天会七年(1129)金兵入山东衮州,睿宗(宗尧)为都元帅,告诫军士,“以夫子所生之地,不得剽夺”。十九日,命曲阜知县衡雄与县吏等引诣宣圣庙。“既至庙庭,以建炎群寇之火,皆为灰烬,而殿火犹未息。元帅乃登杏坛,望殿火,奠拜讫,诣圣林。时有军人发掘二代泗水侯墓,方深六尺余,又伐破四十六代孙宋刑部侍郎墓,元帅亲见,遽命执缚,乃奠拜先圣陵下,周览久之,以伐墓十二人随行,至庙南十余里,尽杀之。”^{[8]29}从宗尧此举可见其对孔子的崇敬之心,而对破坏者的严厉处置亦可见其对时人产生的警示作用。

及至熙宗即位之时,儒家“道统”^①得到这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同。熙宗兴制度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并亲祭孔子。是时,熙宗颇读《论语》《尚书》《春秋左氏传》及诸史、《通历》《唐律》,乙夜乃罢。皇统元年(1141)三月,^②熙宗谒奠孔子庙,北面再拜,顾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大凡为善,不可不勉,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万世高仰如此。”^{[11]2311}在熙宗的倡导下,金朝从此尊孔重儒,

以儒家思想作为新的统治工具。金统治者将儒家思想提升为治国纲领,为了宣示其正统地位,就需要对儒学的传播载体——孔庙进行大规模修建,^③恢复因战乱而长期废止的释奠礼。孔庙释奠礼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统仪式化的表征,在金朝得以延续,并转化为王权合法性的根源。

海陵王即位后继续熙宗时期的尊孔政策。史料中未见海陵亲祭孔庙的记载,但天德初年诏令:“定礼仪,凡职官到任谒庙,先诣宣圣庙,奠拜讫,方许诣以次神庙,于是著之甲令。”^{[8]30}朝廷规定所有职官在到任前的谒庙环节中,必先拜谒孔庙,然后再拜其他神庙,这样就把孔庙地位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重新拟定释奠礼,使金朝的释奠礼更具规范性。是年正月初六日,以国子监申请“每年春秋仲月上丁日,释奠于文宣王,案典礼合用笾豆俎坩簠簋罍尊等为祭器,实以豕羊牲体鹿麋醢醢等为祭,酌献利爵罍洗篚箱,皆有制度;献官拜跪、登庙、降阶,皆有节次;学生各执事庙庭,奏大乐,三献官并分献,以次行礼毕,焚祝与币。”当时的情况是每遇释奠,由国子监支出钱六十贯,这笔资费不是小数目,但行释奠礼时,并没有按照上面的祭祀制度执行,而是“止造茶

① 关于道统与治统的关系,国学大师钱穆有语“礼书所见之道统与治统关系,可归为以下之图式:君欲治,必由学;欲立学,必祭圣师。此时之君即治统,圣师为道统,道统则高于治统。”(见钱穆《治统与道统——从中国文化看国父与故总统孙、蒋二公及当前之学术界》,载《“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专题选刊》,“中央研究院”1977年版,7页。)

② 关于熙宗北面拜孔子的具体月份,《金史》中有不同的记载,如《金史》卷三五《礼志》记载:皇统元年(1141)二月,“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又《金史》同卷中还有:是年,“熙宗诣文宣王庙奠祭,北面再拜,对儒臣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孔子虽无位,以其道可尊,使万世高仰如此。”再有《金史》卷四《熙宗纪》:皇统元年二月,熙宗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以上所列《金史》中的史料所记熙宗亲祭孔庙的时间都是“皇统元年(1141)二月”,与列传中所记的“三月”不同。

③ 关于金朝孔庙的修建可参看前引张敏杰文、于学斌文,此不赘述。

食等物,以大小椀楪排设,用留司乐,以乐工为礼生,率仓场等官陪位,似未合古礼。”依照古礼,释奠礼的祭器、用牲、献官、学生、用乐、用币等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故国子监提出,国家承平日久,典章文物当灿然备具,以光万世。“况京师为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观仰,拟释奠合用器物、以至行礼次序”^{[12]297}。世宗准请,自此,金朝释奠制度更加规范化。

(二) 册封孔子后裔

金代对孔子的尊崇,还表现在优崇孔子后裔方面。衍圣公是指由朝廷册封孔子嫡裔,以其为阙里本庙的献祭者,主持孔庙祀事。因此,衍圣公是国家授予的特殊职事官衔。

金朝册封衍圣公自孔璠始,其后有孔拯、孔揔、孔元措。终金一代,对孔子后裔始终恩宠有加。孔璠是孔子四十九代孙,于齐阜昌三年(1132)袭封衍圣公,主管曲阜孔庙祀事。天眷三年(1140)袭封衍圣公^{[11]76}。熙宗即位后,诏求孔子后,加璠承奉郎,袭封衍圣公,奉祀事^{[11]2311}。海陵天德二年(1150),确定袭衍圣公的俸格^{[11]96}。皇统三年(1143),加拯承直郎^{[11]2311}。大定元年(1161),加孔揔文林郎;特授袭封衍圣公孔揔兖州曲阜令,封爵如故。明昌元年(1190),加孔元措文林郎^{[11]2312}。明昌二年(1191),章宗诏孔元措袭封衍圣公,“文宣王五十一代孙孔元措,秀阜衍详,清洙流润,芝兰异禀,蔚为宗党之英,诗礼旧闻,蚤服父兄之训,语年虽妙,论德已成。肆疏世爵之封。”^{[7]150-151}同年,章宗诏袭封衍圣公孔元措视四品秩^{[11]218}。明昌三年(1192)四月,章宗诏曰:“衍圣公视四品,阶止八品,不称。可超迁中议大夫,永著于令。”^{[11]2312}明昌初,学士党怀英举荐孔元措“年德俱高,读书乐道,该通古学”,章宗将其召至京师,特赐王泽榜及第,除将仕郎、小学教授,以主簿奉致仕^{[11]2312}。四年(1193)夏四月,敕有司,以增修曲阜宣圣庙工毕,赐衍圣公以下三献法服及登歌乐一部,仍遣太常旧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备祭祀^{[11]235}。承安二年(1197)二月,特命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世袭兼曲阜令^{[11]241}。后因蒙古兵南下,孔元措随宣宗迁汴京,曲阜孔庙由其兄孔元用主持祭祀。贞祐三年(1215)冬十月,召中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为太常博士。宣宗“初用元措

于朝,或言宣圣坟庙在曲阜,宜遣之奉祀。既而上念元措圣人之后,山东寇盗纵横,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绝之也,故有是命”^{[11]314}。孔元措作为金最后一位衍圣公,历事章宗、宣宗、哀宗,元军攻下汴京,元措为元所得,仍袭封为衍圣公。

孔子世系历代相传,两千年绵延不衰。“孔子起韦布,践素王,以笔札绍明圣人之统,寢明寢昌,称万世师。爵则真王,礼乐则天子,其子孙亦以渐而隆崇,号为上公,秩乃六卿”^{[13]706}。虽是金王朝这样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对之亦未加裁损,传承了华夏礼制文化。

二、金朝孔庙释奠祀仪

释奠礼在唐以前或属于吉礼,或属于嘉礼,总体上还是偏向于嘉礼。至唐朝释奠礼在五礼体系中明确归属于吉礼^[14],后世相沿不变。金朝释奠礼是国家祭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行礼时间及地点

金朝释奠文宣王用每年春秋仲月上丁日,这是属于每年定期举行的常祀,另外还有不定期举行的非常祀。

关于金朝孔庙释奠的常祀制度是遵唐制,还是宋制,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现考如下:纵观唐朝释奠礼,每年的常祀次数不是始终如一的,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六月于国子监立周公、孔子庙,令有司“四时致祭”。《大唐开元礼》记载,至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下诏,增封孔子为文宣王,两京乐用宫悬,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摄行事。唐肃宗上元年间将文宣王祭祀由春秋二次减为秋季一次。唐代宗时又恢复其春秋祭祀之礼。由此可见,唐朝释奠礼主要是春秋两次致祭。北宋祭祀文宣王大体沿袭唐制,但其规格高于唐制,春秋二丁及仲冬上丁贡举人谒先圣先师,命官行释奠之礼,皆如旧典^[15]。由此可知,金朝所拟的每年在春秋仲月上丁日二次行释奠礼是遵照唐朝旧制,而非宋朝的每年“春秋二丁及仲冬上丁”三次致祭。金朝释奠常祀于每年仲春(二月)、仲秋(八月)上丁日,中央在京师的宣圣庙、国子监^{[12]306},由礼部、太常寺、国子监官充任三献官^{[12]298}。地方释奠礼在州郡庙学举行,由州刺史主持^{[12]306}。此外,史籍中也有金朝皇帝亲自参加释奠常祀的记载,如承安二年(1197)春丁(仲春

上丁日) ,章宗亲祀 ,以亲王摄亚、终献 ,皇族陪祀 ,文武群臣助奠。皇上亲为赞文,“旧封公者升为国公,侯者为国侯,郈伯以下皆封侯”^{[11]817}。章宗贵为天子,不但亲行释奠礼,而且北面而拜,如弟子礼,甚至亲自撰写赞文;又提升崇祀对象的封爵等级,如对曾参,唐开元二十七年(739)追封“郈伯”,宋大中符二年(1009)加封“郈侯”。章宗称曾子为“郈伯”,说明金此前应该是遵唐制对曾子封的“伯”的,而章宗这次将其提升为“侯”,与宋相类。可见章宗对孔子的尊崇已经超过了此前金朝的历任皇帝。

释奠礼的非常祀有时是皇帝遣官行礼,有时则由皇帝亲自主持。如大定二十三年(1183)二月戊申,以尚书右丞张汝弼摄太尉,致祭于至圣文宣王庙^{[11]183}。这次行礼虽在二月,但不是在上丁日,不属常祀的范畴。明昌三年(1192)冬十月壬子,有司奏增修曲阜宣圣庙毕,敕“党怀英撰碑文;朕将亲行释奠之礼,其检讨典故以闻”^{[11]224}。章宗此次亲祀孔子于曲阜宣圣庙,时间是冬十月而非春秋二仲月,应属于非常祀。明昌四年(1193)八月丁未,章宗行释奠礼,北面再拜,亲王、百官、六学生员陪位^{[11]2312}。此次行礼地点是在孔子庙^{[11]230}。查朔闰表^{[16]141},得知是年八月丁未是农历十三,而不是这个月的上丁日(丁酉——初三),因此,章宗这次行释奠礼也属于非常祀。

(二) 孔子冕服及颜、孟并配

孔庙释奠礼属于祭祀先圣、先师之礼,只是历代先圣、先师指代的人物并不相同。简而言之,汉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曹魏罢周公祀,专祭孔子,以颜渊配享。北魏、北齐加以延续,合祭孔、颜^[17]。北周和隋文帝统治时期,周公取得了先圣的地位,孔子降为先师^{[18]168-169}。进入唐代以后,先圣先师的对象多次发生变化,至开元二十七年(739),玄宗下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最终孔子的先圣地位得以重新确立,此后再无变化^[14]。

金代继续尊孔子为文宣王、至圣文宣王^{[12]298-299},金朝孔庙中孔子的冕服大体依唐制,但在议定的过程中,更能体现出这个王朝恪守古制的追求。大臣上奏“今都、郡、县文宣王之庙像,或用九旒冕、九章,如周之上公、汉之诸侯王之服,或服十二旒王者之冕,采章错乱不次。今所

详定,请以文宣王冕服备十二章。”^{[19]377}唐玄宗诏出王者衮冕以衣孔子,至于衮冕的具体等级是依照古时称王的天子,还是后世受封为王的皇子和异姓诸侯?唐玄宗所言王者衮冕,如依古制天子之王,则当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依后制诸侯之王,则当用冕九旒、服九章。由于史载不详,唐朝释奠礼中孔子服章冕旒究竟为多少,不得其详^[20]。而金朝拟定释奠礼时参考的是唐开元礼,“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但在唐朝执行不详的情况下,金选择了依据古制,“《周礼》王者之服衮冕十有二旒,其服十有二章,诸公之纁旒九。就今文宣王、兖国公冠服已依典故,其邹国公合与兖国公一体装塑,九章服,拟迁邹国公之像于宣圣之右,与兖国公相对,准上冠冕装塑”^{[12]297-298}。

可见,金朝在这次议定释奠礼过程中,世宗所定的孔子、颜子、孟子像的冠服级别,的确继承了唐朝的以“王者衮冕”装塑孔像的制度,但在冠冕级别上,将孔像冠冕定在周制的天子级别。与宋朝相比,金朝的“服十二章”高于宋朝的“服九章”,因此孔元措有言“宋崇宁四年,赐孔子冠服,冠十二旒,服九章。故金所赐章数,于礼为备。”^{[8]30}金朝所赐的孔子服十二章与《周礼》王者冠冕级别相同,而。

配享之礼古已有之,其目的在于报功劝忠。古人祭祀天地、社稷、宗庙,都须依据一定的礼制原则,选择一位或数位配食者。

金朝议礼,多参照唐礼,间或仿宋,在制定孔庙释奠礼时参考了《唐郊祀录》《唐开元礼》等礼典,其祭祀对象也自然被承袭过来,先圣依然是孔子,然而配位除了颜子之外,还增加了孟子。这种祭孔配享人物的选择有类于宋,又不完全与之相同。孟子获封赠为邹国公是始于宋元丰六年(1083),次年配享孔子。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孔庙配享定制为颜回、曾参、孔伋、孟柯四人。此后,孔庙中的塑像基本稳定在孔子、四配、十哲等人身上,共十五位,其他从祀则或塑像或图画不一。宋以后孟子地位不断提高,金开始出现邹国公与兖国公并尊局面。金代这一传统为元代所继承,元至顺元年(1330),文宗封颜子为兖国复圣公、孟子为邹国亚圣公。

金人增加孟子配享孔子的理由是“兖国公(颜子)亲承圣教者也,邹国公(孟子)力扶圣教者

也,当于宣圣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后堂,宣圣像侧还虚一位,礼宜迁孟子像于宣圣右,与颜子相对,改塑冠冕,装饰法服”^{[11]816}。

金代孔庙的祭祀对象除了孔子和颜、孟之外,还有“七十二贤、二十一先儒”。“七十二贤”是指孔子七十二弟子。东汉永平十五年(72),汉明帝幸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此后,习惯上将孔子七十二弟子画于孔庙两侧墙壁上。唐开元八年(720)以后孔子的七十二弟子皆作为“先贤”从祀于孔庙。关于“二十一先儒”据《旧唐书》卷三记载:贞观二十一年(647)“二月壬申,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萇、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宁等二十一人,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自今有事于太学,并命配享宣尼庙堂。”^{[21]59}同书卷二十四记载此事时还有贾逵,共为二十二人^{[21]159}。《金史·礼志》所载二十一先儒,未具体记载姓名,但从拟礼的过程中多参考唐朝制度这一点来推测,金朝二十一先儒很可能是《旧唐书》所记载这二十一人。

金朝继续推崇孟子主要与孟子的道统有关,孟子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是儒家学派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推崇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金人以孟子“是生真儒,宏才命世。言而为经,醇乎仁义”,能够“力扶圣功”,故而尊崇孟子与孔子、颜子“同垂万祀”^{[11]817}。这样的变革是金朝统治者崇尚儒学的直接表现。

(三) 祭祀仪节

金朝在拟定释奠礼数的祭祀仪节时,参考了唐《开元礼》,但并没有完全照搬。如在祭祀用乐方面,检讨到唐《开元礼》释奠用轩悬,后又用宫悬,金以释奠礼是“中祀”,用轩悬、宫悬似太重,而应只用登歌,方与之相应。金在这一点上与宋颇为相似,金、宋释奠均用登歌^{[12]298}。宋朝在议定祭孔用乐时,认为“唐开元中,释奠文宣王始用宫架之乐。然孔子,人臣也,用轩架足以为礼,用宫架则过矣”^[15],而用登歌。由此可知,金虽然在议礼时屡次提到参酌唐朝礼典,但是在定礼之时,在某些具体仪节上又有承宋的成分。此外,金还有不依照唐制或宋制,而自行拟定的本朝具体仪节,比如在祭祀用牲方面,唐^{[22]355}、宋均为太牢^{[23]139},而金较减省,每祭只用“羊三、豕三”。

金朝都城孔庙祭祀为中祀,宣宗迁汴,国土日蹙,社稷渐倾,建孔庙会朝门内,岁祀如仪,宣圣、颜、孟各羊一、豕一,余同小祀,共用羊八,无豕。但是,金朝诸州释奠并遵唐仪^{[11]817}。

三、金朝孔庙释奠礼的作用

综观金朝孔庙释奠礼,其承继唐朝礼制的成分比较多,但其中也有承袭宋朝礼制的部分,在此基础上,更有本朝的创新之处,金代孔庙释奠礼以其独特性,在中华礼制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一,金代孔庙规格空前提高,拓展并提升了崇孔尊礼的空间。金代继承了隋唐至北宋沿袭下来的庙学合一的成例,熙宗建筑了中国封建时代地理位置最北的孔庙,将中华大地上儒学所涵盖的区域向东北拓展了一千多里^[3]。章宗时孔庙规格达到空前的极致,第一次把孔庙的建筑制式与皇宫等同了起来,同时在庙门前新建了“灵星门”。“灵星”是“棷星”的本称,孔庙前的棷星门,即取“得土之灵”之意,又因门形如棷窗,故得名“棷星门”。棷星门在牌楼中占有特殊的地位^{[24]130}。“按照‘灵星即天田星’,汉高祖祭天祈年,命祀天田星’等说法,灵星门的建造,象征着祭孔如同尊天。”^[3]明昌二年(1191)朝廷赐予钱七万六千四百余千,①重修曲阜孔庙,比宋代增加了五十余间,大成殿和两庑首次采用绿色琉璃瓦作剪边,青绿彩画,朱漆栏帘,大成殿外的楹柱首次使用了雕龙石柱^{[25]54},使孔庙规格空前提高。金朝广泛建立孔庙,行释奠礼,推行儒家礼仪教化,这表明以女真族为主导的金朝文化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主流文化之中。

其二,金君变夷从夏,政治意义深远。金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但其皇帝对孔子的崇尚程度不亚于中原天子。金初海陵既已规定所有职官上任前谒庙要先拜孔子,而后其他,将孔子地位大大提高。熙宗即位后拜祭孔子,北面如弟子礼,把孔子

① [清]张金吾编《金文最》,中华书局1990年版,1025页。在梁思成所著《梁思成全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52页)中,引党怀英此碑“为钱七万四千六百四十千”,而《金文最》中章宗所拨钱数“为钱七万六千四百四十千”,可见梁文此处引文有误。

抬到至高地位。世宗继承儒家思想,“变异源为同流”。章宗数次亲祀孔子,尊孔崇孔之心无以复加。在朝廷大力推行儒礼,倡导儒学,使“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由于金统治者加强典章制度建设,注重推动释奠礼,使得儒学对国家政治的指导作用越来越深化。“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11]2713}元好问认为金朝“典章法度几及汉、唐”^{[11]2742}。金朝皇帝继承孔子的尊尊亲亲思想,摒弃了孔子思想中以“人禽”区分华夷的标准,尊孔崇儒,行中原制度,取得与华夏平等的地位,“打破了少数民族中的人物只能在中原做臣不能做君的旧观念的束缚”,变地方政权为中原式政权,“与中原车书一家”^[26]。

(三) 传承华夏礼仪文明,文化意义重大。金代继承了中原王朝的释奠礼,将其推行于相对落后的北方广大地区,以示遵循先圣先师的教诲,兴学以礼教化民众,使“孔圣之为,万世宗传。凡百儒者,则而效焉。”^{[7]264}金朝在儒家礼仪文化影响下,涌现出大量忠臣和孝子,记入《金史》的忠义死节之士就达八十多位。金统治者学习中原王朝礼仪文明,以此施教化、明人伦、正风俗,这在客观上达到了促进国家政通人和、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也发挥了传统道德的教化作用。金朝在建立理想化的礼治秩序的同时,向广大的统治区传播着华夏文明,加速了北方“蛮夷之地”各族人的文明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言,孔庙释奠礼所表达的是对传统的中华文明的敬意,具有提倡文教的文化内涵。古代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都奉孔子为正宗,惟其如此,不论政权如何更迭,中华文化始终绵延不绝^{[27]928}。

参考文献:

- [1] 孔德平,彭庆涛,孟继新. 祭孔礼乐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2] 赵克生. 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3] 张敏杰. 金代孔庙的修建及其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J]. 北方论丛,1998(6).
- [4] 于学斌,孙雪坤. 金代孔庙的发展、成因及作用[J]. 北方论丛,2003(4).
- [5] 张帆. 金代地方官学略论[J]. 社会科学辑刊,1993(1).
- [6] 张鸣歧. 金元之际的庙学考论[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6).
- [7] 张金吾 编. 金文最[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8] 孔元措. 孔氏祖庭广记[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 [9] 庄绰 撰;萧鲁阳 点校. 鸡肋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0] 宇文懋昭 撰;崔文印 校证. 大金国志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1] 脱脱 等. 金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2] 张曜. 大金集礼[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3] 王世贞 撰;魏连科 点校. 弇山堂别集:衍圣公爵系表[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 朱溢. 唐代孔庙释奠礼仪新探——以其功能和类别归属的讨论为中心[J]. 史学月刊,2011(1).
- [15]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6] 陈垣. 二十史朔闰表[M]. 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 [17] 刘军. 北朝释奠礼考论[J]. 史学月刊,2012(1).
- [18] 史睿. 北周后期至唐初礼制的变迁与学术文化的统一[M]//唐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19] 杨士奇 等 编. 历代名臣奏议[M]//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20] 董喜宁. 孔庙孔像考[J]. 孔子研究,2011(4).
- [21]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2] 大唐开元礼[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 [23] 脱脱 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4] 长驭寰. 中国古建筑源流新探[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
- [25] 范小平. 中国孔庙[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54.
- [26] 张博泉. 略论金代的儒家思想[J]. 社会科学辑刊,1999(5).
- [27] 王群 主编. 礼仪宝典[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那晓波]